



香港在中國經濟雙循環中的策略性角色

(「國內國際雙循環」專題討論之二)

近月來，中央最高層明確提出要加快構建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為制訂「十四五」規劃乃至未來更長時期的發展策略奠定主基調。這一影響深遠的國家戰略思維公佈後，旋即在本港政商界引起高度關注和熱烈討論。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在接受採訪時亦表示，「現在內地是國內國外雙循環的經濟佈局，我希望香港的企業都能參與在國內的市場；在國外的循環就是更用好香港跟國際的聯繫，我們提供一個平台給內地的企業，尤其是到一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去發展」。

一直以來，香港因應內地在不同發展階段的需要而不斷調整定位，在參與、協助國家經濟發展的同時，亦提升和擴展自己的經貿功能、產業實力以及在國際市場上的地位。以自己之所長服務國家之所需並在此過程中發展壯大，正是香港過往賴以成功的秘訣，亦是本港今後持續發展的不二法門。當前中國經濟邁向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對香港來說既是挑戰，亦會帶來新的契機；香港應一如既往地擔當起參與者的角色，發揮促進者的作用，並從中分享到受益者的「紅利」；透過靈活「轉身」和策略轉向，更主動、有系統地融入國家的發展，以把握、發掘和創造箇中的機遇，推動本港經濟在更廣闊、更高的新平台上再出發。

內循環的直接持份者：適時推動角色轉向

中國經濟要「大船轉舵」，邁向以內循環為主的發展模式；故名思義，必然要擴充、提升以國內要素資源(包括自然資源、人力、技術、資本等)和國內產業鏈為基礎的經濟活動，以及進一步做大、做好內部市場的「蛋糕」。循此思路，內地將加快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推動國內市場的供應端與需求端更好地匹配、契合以及互動，使得生產、流通、分配與消費各環節更多地依託於國內市場，並實現全程貫通，從而形成生生不息的國民經濟循環體系，激發出內生型增長的持續動能。

若以發達國家為標桿，中國內地目前無論是人均消費水準、消費總量佔國家GDP的比重等量化指標，抑或是內需產品與服務的品質水準，均有巨大的上升空間。例如，2019年中國的居民消費率雖已上升至六成左右，但仍低於歐美主要發達國家接近80%甚至更高的水平；以社會零售消費金額看，中國市場的整體規模已接近長期雄踞世界最大消費市場「霸主」之位的美國，但考慮到中美之間人口數量相差懸殊，目前中國的人均消費金額其實僅為美國的約四分之一。疫情爆發之前中國居民的出境遊活動一直保持快速擴張，內地旅客每年在海外的消費金額已經突破千億美元；而導致「消費外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民眾熱衷購買海外的優質商品和服務體驗，這亦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內地市場在一些本土商品和服務

供給領域仍舊差強人意。

作為內地最大的外來投資者，港商在內循環經濟建設中自然不會缺席，更是其重要的持份者和直接參與者之一。近年，內地港資製造業企業面對歐美傳統市場的需求疲弱，對開拓多元化市場的迫切性不斷提升；加上今年以來新冠疫情在西方國家大規模蔓延，導致當地經濟大幅萎縮，對海外產品的進口需求銳減。在外部環境加劇惡化的態勢下，內循環發展策略的啟動無疑為在內地的港資製造業帶來了拓展內銷的歷史性機遇。

事實上，中央在當前的特殊時點提出內循環經濟的發展思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要為「雪擁藍關馬不前」的外向型產業尋找突圍之路。作為主要持份者之一的港資製造企業亦應適時轉向，從出口導向型加緊向內需型轉軌；這既是應對海外市場挑戰的現實抉擇，亦是主動參與內循環建設的應有之義。根據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2020 年 6 月公佈的一項有關粵港澳大灣區港資製造業的研究報告，在 400 家受訪的港資企業中，有接近六成同時兼營出口和內銷業務，更有 13.3% 的企業表示已將業務重心擺在內地市場。

惟港企在拓展內銷的過程中，必須從發展策略、管理思維及企業運作等範疇作出根本性的轉變；融入內循環並非只是簡單延續以前「清倉式」的「出口轉內銷」，而是要緊密配合主要銷售市場和服務對象的改變，積極、主動、有效地回應國內消費者的需求，特別是應更有針對性地開發適銷對路的新產品。在營銷方式上，港企亦要直接地深入到個人消費者層面，從傳統出口貿易慣用的 B2B 交易模式逐漸轉向 B2C 的零售模式，並更多地運用時下內地消費者「受落」的電商平台、新媒體以及直播帶貨等市場進入渠道。近年香港廠商努力推動從「貼牌生產」(OEM)向「原創品牌製造」(OBM)轉型，加緊邁上高品質、高增值、品牌化的發展路線，這在某種意義上將會是參與內循環的必由之路。

與此同時，內循環經濟的高效運行將催化內地服務業的擴容和增效，作為服務業大壘的香港應不難從中「分得一杯羹」。近年香港的服務業者利用中港兩地政府簽署「CEPA」協議賦予的便利性和地理位置上「近水樓台」的有利條件，加快投資內地的步伐，在某些範疇亦建立起進入國內市場的先行者優勢。但須看到，香港服務業過往在內地的經營活動一般較側重於生產性服務，並具有高度的外向型特點，主要是為港資生產廠商、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的涉外經濟活動提供貿易、融資、商業服務等方面的配套服務。

隨著中國經濟發展的定位從「世界工廠」向「世界工廠 + 世界市場」轉化，在內地的香港和外資廠商的市場方向將順勢調整為「由外轉內」或者「由外加內」。香港的服務業者一方面須應時而動，爭取壯大在內地市場的業務規模；另一方面應樹立更廣闊的發展視野，加緊開拓服務內地企業的業務，特別是瞄準一些已經「羽翼漸豐」的民營企業，同時亦須配合國內經濟結構的轉型以及消費市場、供應鏈升級進行業務創新與更新，例如提供研發、設計、品牌管理、檢測認證、管理培訓、法律合規、公司管治、環保績效以及 ESG (環境、社會和企業管治)等領域的服務。

港商除了繼續發揮自身固有長處、從屬於流通環節的生產性服務「發圍」之外，亦應積極參與內循環的消費性服務環節，善用香港在高品質、國際化生活文化、專業服務精神等方面的優勢，進軍內地的消費性服務市場，特別是教育、養老、理財、醫療健康等具有廣闊市場空間和增長潛力的「藍海」行業。須留意的是，要達成上述的轉向和轉型，香港業者勢必要加緊在內地市場「落地生根」，開展更多的「在地化營運」以代替之前的「長臂管理」，以及更積極地「移船就礮」，更貼身地服務內地消費者；這或許會帶動起新一波港人特別是青年人的北上創業和就業潮。

雙循環格局下的特區：用好「亦內亦外」優勢

以辯證的角度看，內循環與外循環是驅動經濟發展的「雙輪」，二者既各司其職，又互聯互通，緊扣互動；但在戰略部署的層面以及效率與風險平衡的考量上，內外始終亦有分別，各有明顯不同的特徵和強弱之處。對國家的發展大局而言，內循環經濟的可控性、穩定性以及可規劃性相對較強，兼且勝在對外部風險的暴露程度低、對內部產業的關聯作用較大；但其不足之處在於整體市場容量及發展潛力相對受限，資源配置的種類及效率有所不足，特別是推動創新和科技發展的基礎條件會相對狹窄。

外循環經濟則相反；雖然對國家經濟運行造成的波動性和不確定性較高，但其可涉及的潛在市場總量巨大，並且具有多樣性的優點。透過外循環，一個經濟體可以遵循國際經貿理論中的比較優勢、學習曲線、後發優勢等原則，實現生產要素資源的合理配置，並獲取技術擴散、專業化分工等方面「效率增益」(Efficiency Gain)所帶來的巨大好處。簡言之，在效率與風險的平衡上，外循環與內循環各擅勝場；兩者必須有機結合、相輔相承，才能締造最佳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香港一向是內地通往世界的窗口，是內地市場與國際市場的超級聯繫樞紐。在中國經濟雙循環的體系中，香港將會是天然的聚點、合龍處和交匯區，對內外雙迴圈的互聯、互通與互動起到「啣合」以及「打通關節」的關鍵性作用。隨著內地經濟發展模式從「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外向型轉為「以內循環為主、外循環為輔」的雙輪模式，香港傳統的中間人、橋頭堡角色仍將繼續發揮作用，但需要亦步亦趨地進行方向切換和功能調整。例如，香港以前側重於協助內地商品對外出口、民企「走出去」、海外資金「引進來」等中介角色；現在除了進一步強化相關服務之外，還應當努力涉足「反向操作」，例如協助優質的海外產品、服務和先進技術進入內地市場，以及配合人民幣國際化和內地居民財富的全球化配置需要，打造內地資金「出海」的首選地、中轉樞紐和增值站。

值得指出的是，香港對國家發展而言具有「亦外亦內」的戰略價值。一方面，香港作為享譽全球的自由港，兼且是國際商業、金融、航運和旅遊中心，具有高度開放的優勢；香港經濟在本質上是國際經濟的一部分，並擔當著中國經濟外循環的重要節點。另一方面，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又是國家內部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其經濟、社會以及管治都對中央保持高透明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風險較

低、可控性較高等內循環的特點。香港可借重自己在「一國兩制」之下的特殊位置，恰如其分地將本地的產業發展嵌入、融合於雙循環軌道之中，在力爭為國家未來發展作出新貢獻的同時，亦為自身產業經濟打開新的發展空間。

亦就是說，香港未來可以憑藉特殊的「雙重身份」，在國家外循環與內循環的運行中「靈活走位」，擔當起內外循環互為切換、轉化、融匯的「隨意門」和「安全閥」，並從中為自己的產業發展發掘新機遇。例如，以創新科技發展和「再工業化」為例，《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指出，要「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域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並提出了建設科技強國、人才強國、製造強國、品質強國等目標；凸顯了以高品質的供給引領和創造內需、以自主創新推動科技自立和自強，將會是內循環經濟的兩大動力源。

香港享有作為獨立關稅區和世界貿易組織單獨成員的特殊地位，而根據《CEPA 貨物貿易協議》，原產香港的貨物進口內地時可全面享受零關稅的優惠；廠商在香港設立供應鏈既能同時面向國際市場和中國內銷市場，亦能便捷地與內地完善的配套產業體系進行緊密的銜接與分工協作。更重要的是，歐美等發達國家對貿易以及科技的管制措施一般不適用於香港，或者對本港的影響程度相對較輕。香港國際化的社會氛圍、卓越的教育水平、優越的制度以及尊重學術自由、重視知識產權的風氣，一向對國際科技人才具有不俗的吸引力；近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出現了科技領域的閉關鎖國傾向，甚至針對內地人才施加「科技排華」，香港實有條件吸引和匯聚從海外回流的亞裔人才。

香港應用多、用好「亦外亦內」的優勢，吸引本地和內地的廠商以及世界各地的科技人才來港發展，把握機會在高科技產業上進行策略性佈局，例如可選定一些與內地有共同發展興趣、具備市場潛力的科技領域，開展聯合研究開發與量產化，比如新材料、節能環保、生物科技、機械人、物聯網等；一來利用本港得天獨厚的位置和制度優勢幫助企業分散經營風險，讓科技人才在有利環境下盡展所長，另一方面亦可借助「香港製造」、「香港品牌」的正面效應，為內地和國際市場輸送高質素、高附加價值的技術和產品。

又如，隨著中美之間的全方位對抗升級，美國參議院在今年5月通過《外國公司問責法案》，收緊對外國公司的上市標準，促使在美國上市的中國概念股公司加快回流香港進行二次上市；亦有越來越多的內地新經濟企業例如「螞蟻集團」等更選擇直接赴港上市。香港正是得益於身為中國「國內+境外」的國際金融中心的獨特定位，成為內地企業在尋求境外上市融資時的不二選擇。香港不但可以發揮著金融「緩衝帶」、「防波堤」的作用，以減低歐美市場針對內地企業收緊上市門檻及監管要求而產生的政策風險，而且還具有資金自由流通、金融基建發達、商貿服務完善以及金融市場法規、監管文化和行事慣例等與國際高度接軌的優勢，讓內地企業得以通暢無阻地進入國際資本大市場，實現融資結構的多元化和國際化。

另一方面，近年香港與內地金融市場已建立起「滬港通」、「深港通」等互

聯互通機制，內地投資者可以便捷地參與投資境外的股票，藉此分享中國新經濟龍頭企業高速成長所帶來的豐厚回報。可以說，憑藉「亦內亦外」的特殊角色及其「海納百川」的強大金融服務能力，香港今後將繼續引導海外資本參與中國經濟內循環，更可為內地資本參與國際循環開闢通道，以及為內地推進資本領域的內外貫通探尋路向。

再如，國家近年來積極籌備推行數碼貨幣，今年以來更先後在多個內地城市進行數碼人民幣的測試運行，8月起將試點範圍擴大至28個地區，粵港澳大灣區已被納入其中。香港作為全球首要的離岸人民幣中心，在各項人民幣業務操作上累積了豐富經驗和基礎，更長期擔當國家金融創新和資本市場對外開放的「防火牆」和「試驗田」；香港可爭取中央的支持，在數碼人民幣的跨境應用時選擇以本港作為首個「落地點」。香港若能擔當起數碼人民幣走向國際的「排頭兵」和「試金石」；除了有助於繼續保持自身在離岸金融業務的「先行先試」優勢外，亦可為國家推動數碼人民幣在境外市場流通時可能遇到的技術、法律、用戶經驗等各方面的問題探討解決方案。

投身區域經濟融合：助構建國際分循環

近年來，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顯著升溫，經濟全球化的進程遭遇重大挫折；雙循環的發展理念正是產生於西方國家出現逆全球化、去中國化、產業鏈「脫鉤」等思潮洶湧的時代背景之下。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面對的國際環境，與改革開放後的頭三十年全球化在世界範圍內高歌猛進的「黃金年代」已不可同日而語。這亦意味著中國未來的國際循環之路難以延續過去的全球一體化模式，或會更側重於以不同形式的區域性經濟合作為基礎的區塊循環、分支循環。

事實上，相比起以世界貿易組織為基礎的全球性多邊貿易談判，區域經濟一體化有「小而精準」的特點，一般會涉及更廣泛的開放領域、更深層次和更制度化的國際間經濟協調，以此為依託的外循環相信亦有利於增強其與內循環協同關係的穩定性。另一方面，區域一體化通常都是成員國主動參與的結果，加上參與各方之間的經濟實力差異相對較小或者產業互補性較強，使得談判過程更能夠平衡各成員國的利益。中國要構建新形勢之下的外循環體系，可聚焦特定的區域經濟板塊，透過主動地設計、釐定自身在不同區域經濟合作中的角色以及「有所取，有所予」的定位，鞏固外循環參與各方作為「命運共同體」的利益基礎和提升內外循環的契合度。

有見及此，香港應一如既往地積極參與以內地倡導的區域經濟合作，例如「一帶一路」倡議、「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和「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等，並努力在有關成員國與中國的經貿合作中發揮節點與超級聯繫人的作用，從而捕捉區域經濟整合所創造的市場空間和發展機遇。同時，隨著亞太區內區域一體化加速推進，國際經貿合作的談判除了聚焦於商品關稅減免外，還更多觸及非關稅壁壘和市場准入以及更高標準的制度型開放。香港作為一個自由開放的市場化經濟體，可以在服務貿易、知識產權、環保標準、勞工要求等方面，

為國家在進行對外經貿談判時擔當技術顧問和先行探路的「盲公竹」。

值得指出的是，香港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中心城市之一，更應帶頭推動大灣區在國家雙循環的思維下進行戰略重構以及合作模式的優化。例如，粵港澳大灣區除了全速打造國際科創中心和科技人才中心之外，亦可加快在重點領域推進規則銜接和制度對接，逐步實現內部市場一體化，並透過強化區域市場需求與區內產業鏈條的耦合對接，為構建活力澎湃的區域經濟分循環打造「示範工程」，藉此提升粵港澳大灣區對國內大循環的帶動作用，以及為國際外循環的「內化」和內循環的國際化探索道路。

2020年11月